

◆一周三最

袁厉害：
最模糊的爱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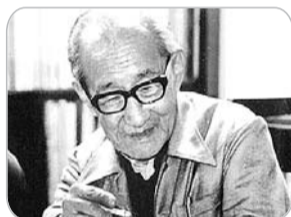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南兰考人袁厉害家着火了，烧死了她收养的七个孩子，于是袁厉害这20多年备受争议的“爱心”人生又一次浮出水面。

火灾后，袁厉害声泪俱下地说，如果她卖过孩子，“逮住了把我枪毙”；当地政府一面自责，一面表示，“袁厉害借弃儿向政府提条件，搞房地产，包揽公路，替人讨债”；民间说法更是走了两个极端，有人说她是名符其实的“爱心妈妈”，也有人说她是借着收养孩子赚钱。

其实，搞清楚袁厉害的真实面孔并不难，或者，如果政府承担起原本该承担的收养责任，这些“爱心爸爸”“爱心妈妈”也不需要去争辩这些事情。只是，当阳光照不进某些地方时，灰暗中的某些面孔才显得那么模糊而难以辨认。

胡汝鼎：
最莫名的怀念



胡汝鼎是谁？
比这更莫名其妙的，是网上意外掀起的对他的怀念潮。

这个出生于1905年的杭州男人，在他去世28年后，因为号称“史上最严交规”的执行，开始被人们怀念“是他发明了黄灯”。

胡汝鼎早年留学美国，曾是爱迪生的高徒。1927年，他站在美国的十字路口看到绿灯亮了，正要向前走，一辆汽车擦身而过，吓了他一身冷汗。后来他反复琢磨，终于想到在红、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灯，提醒人们注意危险。

人们从黄灯想起了胡汝鼎，然后继续发扬网络做事上天入地没有边际的特点，一路怀念到他的生平和各种发明。于是，胡汝鼎在入土28年后，终于意外火了。

其实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怀念逝者——再伟大的逝者，再莫名其妙的逝者，都是想给现实说事。看来，黄灯扣分之争只要不停，对胡汝鼎的熊熊怀念之火就不会熄灭。

丹羽宇一郎：
最一致的大使



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回国了，在日本，他仍然批评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行为，并真实传递回他在日本听到的声音：“日本人=大坏蛋。”

相信日本并不希望听到这种实话，一如我们也不会喜欢听自己的同胞批评自己。而其他了解中国的日本人——如藤嘉一等，回国后都是讲“日本人爱听的话”，中国人对日本真实的态度，相信在日本一直是稀缺的实话。

这让人想起他在日本的表态，他一直反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，“日本的国民感情出了问题，日本是个很怪异的国家”。

丹羽宇一郎流的是日本的血，我们毫不怀疑他的根本立场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在离开中国后，还能继续说出心里的真话，这是让人尊敬的。文/张洪波

电视问政中，面对官员“马上办”的承诺，柳莺更喜欢追问“为什么”，就是要引导官员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——

追问比逼问更有力量

文/本报记者 刘德峰



▲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上，柳莺端给官员一盘卤味拼盘。

“绵里藏针”

“看了这个片子我内心感到很愤慨，也很自责。这种东西怎么能上餐桌呢？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，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道歉。”

2012年12月17日晚，武汉市电视问政演播厅内，接受问政的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，说完这番话，离开座位，向在场的市民代表和电视镜头，弯腰90度深鞠一躬。

当这一幕被央视转播后，人们开始对杨泽发面前那个手端卤味拼盘，面带微笑的中年女主持人产生了兴趣。

演播厅大屏幕上，短片正在播放着垃圾满地、污水横流的卤味作坊，柳莺却手端卤味拼盘，微笑着问杨泽发：“这样的卤味您敢吃吗？”

“肯定不敢吃。”杨泽发和武汉市副市长秦军一起回答。

“那这样不卫生的卤味，是怎样上了老百姓的餐桌呢？”柳莺追问秦军。

“这反映了我们的监管还是缺失的，政府会加大打击力度。节目结束后，我们到现场去，把它端掉。”秦军回答。

随后，杨泽发起身向观众深深鞠躬道歉。

“吓了我一跳！”元旦过后的1月4日，柳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然对那一幕感觉意外。柳莺说，她没想到杨泽发会在现场向大家鞠躬致歉。“这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敢于担当、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形象。”

在武汉电视问政的“期末考试”中，类似这样让官员头疼的问题，柳莺提了很多。这也让武汉江岸区新荣客运站“兔子”（从事非法拉客、揽客、载客）屡禁不止，武汉市电动车牌照管理仍存漏洞等种种问题，被当众摆在相关部门一把手眼前，“下不了台”。

“主持人太给力了。”网友这样称赞已经四十出头的柳莺，“绵里藏针”，“刚柔并济”，甚至送给柳莺“温柔柳一刀”的绰号。

“他们眼里充满了忐忑”

“绵里藏针”比咄咄逼人更考验一个人的功力。

2012年12月17日晚上，武汉电视问政“期末考试”开场前半小时，柳莺悄悄躲在演播厅外的车上化妆。“就是要隔开我和官员们单独接触的机会。”柳莺笑着说。

与柳莺的“不急不慢”相反，第一场接受问政的，武汉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胡志强，副市长秦军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，市编办主任黄松如，市法制办主任倪子林，市人社局局长潘汉生6人，当天下午6时许——问政开始前两小时，就已经到达了演播厅。

完成了电视节目需要的简单化妆后，6人坐在演播厅旁的休息室聊天，如同面对年终大考，他们表现得有些紧张。

晚上7点45分，柳莺最后下车，与被问政官员同时走向演播厅。“我回头看了一下，他们眼神里充满了忐忑。”柳莺说。

电视问政中，当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离开座位，深鞠一躬时，武汉电视台主持人柳莺也被人们记住了。

穿梭在民众与官员之间的特殊角色，使柳莺眼中的电视问政与众不同。一些在台上被她质问的官员，在台下是她的朋友，而这并不是主要的，重要的是，如何能让电视问政不会成为一场“严肃的娱乐节目”，能真正起到作用，能走得更远，这是柳莺经常要思考的。

柳莺站在了她的“特定位置”上，“为什么让我站在这儿？为什么不和官员站在一块儿，也不和市民代表站在一块儿？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也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了。”

其实，在台下，作为当地著名主持人的柳莺和台上的一些官员都是朋友，“但现在站在问政的舞台上，我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。”

武汉电视问政已经推出了6年，在最初，主持人尹晨芳以笑容可掬的“抽老底”方式，为武汉问政节目赢得了“犀利”之誉。但时间长了，问政在解决民生问题、改变工作作风的同时，也让部分市民在看此节目时，有了“看官员出丑、下不来台”的想法。

“问政不是情绪的宣泄。”柳莺说，如果只在电视问政这一天，让市民有一种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的快感，那这个电视问政还是失败了。

“官员灰头土脸，老百姓虽然解气，但就更不相信他们了。同时，官员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。”柳莺认为，当问政双方不同的声音都被倾听了，双方不同的意见都被表达了，双方不同的诉求都被尊重的时候，才有可能产生互信的基础，这也是她所理解的问政节目意义所在。

于是，柳莺在接到主持任务后，开始谋求转变。

柳莺在设计问题时，一般会保持谨慎和克制，“我提出的问题，观众能不能接受？被问政方能不能接受？怎样问才是理性地问，才是公平地问？”

“今天是问政，所以要把各位的不足、各位的缺点放到聚光灯下来炙烤，放到放大镜下去审视，目的是为了改正缺点，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，所以各位区长各位领导，你们要经得起拍砖，忍得住吐槽。”在问政过程中，柳莺这样提醒参加问政的官员。

“我理解的问政，是追问，而不是逼问。”柳莺说，面对官员“马上办”的承诺，她更喜欢追问“为什么”，就是要引导被问政方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。

有市民代表称，与前几年的问政不同，柳莺主持的问政，少了“火药味”。

“重话轻说，”柳莺这样总结她的提问方式。也正是这种主持风格，她被赋予“温柔柳一刀”的名号。

“主持风格变得理性了。”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黄红云这样评价。武汉市政府布衣参事胡志也表示，“虽然问话没有以前那么犀利，但是问政效果却没有减。”

“双方都有备而来，那戏才好看”

包括武汉在内，多地都开始了电视问政节目，这被看作政治开明的有力信号。而这一形式走向公众视野，必然伴随着争议。武汉及主持人柳莺，也在经历着这一切。

“不过是一种‘秀’而已。”有人这样评论电视问政。当官员应对的经验越来越多，应对的技巧越来越成熟，问政会不会变成“秀场”？

“事实胜于雄辩，即使一个官员有三寸不烂之舌，在记者暗访的短片面前，他的话也会失去底气。”柳莺认为，武汉坚持的电视问政，在她眼中已然发挥了作用。

就新荣客运站的“兔子”问题，柳莺与该区区长黎东辉的问答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柳莺后来查看过，如黎东辉所答，新荣客运站的“兔子”由高峰时期的100多个，减少到目前的20多个，并非虚言。

她还告诉记者：“一位官员在电视问政前一个月，列举了200道问答题，天天让同事‘拷问’自己。撇开他问政时的表现不谈，这种态度还是很值得各职能部门领导学习的。”

“如果非要说这是‘秀’的话，那我希望这样的‘秀’越来越多，因为它‘秀’来的，是政府工作风气的改变，是更多官员的尽心尽责，是武汉环境的极大改变。”柳莺说。

现实生活中，柳莺除了主持人的身份外，还是武汉市治庸问责督察员，武汉市政协委员等。她也常常以另一种视角，关注着台上的一切。

“在直播现场，我看到有个大姐伸手想提问，但我请她发言时，她又不敢说。”柳莺清晰地记得这个细节，因为她切实感受到了市民在面对问政时，几乎下意识带有一丝害怕和胆怯。

同样的现场，有团队支撑、有丰富经验的官员，正在表达得越来越流利和清晰，而准备不足的市民则相对弱势，这需要柳莺在主持中掌控平衡，同时她也希望观众能问得更多。

“对老百姓的民主问政风气，我还有所期待，”柳莺说，如果在这一形式中，“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在一起碰撞，那戏才好看。”

“如果让人大、政协来问政，效果会更好。”柳莺期待着电视问政的形式能够继续创新，“我相信，电视问政还会走得更远。”